

中华传统 思想文化渊源

谢承仁◎著



人民出版社

中华传统 思想文化渊源

谢承仁◎著



策划编辑:杨松岩

责任编辑:陈 光

装帧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渊源/谢承仁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
ISBN 7-01-004594-1

I. 中… II. 谢… III. 思想史—研究—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0334 号

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渊源

ZHONGHUA CHUANTONGSIXIANGWENHUAYUANYUAN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24.25

字数:60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01-004594-1 定价:50.00 元

邮购地址 10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许嘉璐

谢承仁先生是我在北京一中读高中时的历史老师兼班主任。1954年,我们年级在高考后纷纷走进大学校园,我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谢先生几乎同时被调到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我们这个班的同学们没有一个是学历史的,就连我这个上了中文系,毕业后专攻古代汉语的,也始终没能窥得先生的门墙,更不可能就史学问题向先生请益——咱们的大学里各系分工太明晰,学生狭而不博,专而不精,弄得我们这一代“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不知先生是否以此为憾。在我,年纪稍长之后每当对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有所思考或疑难时,却是颇有没有及时向先生请教的遗憾的。近些年,我受了现实的刺激,开始注意思考文化领域的问题^①。文化与历史相为表里。屡感史学功底不足之苦,于是愈发追悔。每年和同学们一起去见先生的时间既少又短,见了面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哪里有让我霸占着先生去谈史学的缝隙?平时又难得和先生通一次电话,即使有所疑难,也没有机会请教。

几年前,得知先生正在撰写文化史,一时间颇有与老师殊途同归,“所见略同”的暗喜,另一方面也很为先生担心:他自年轻时即羸弱,近年来视力越来越坏,已经近乎失明。他自己说这是由遗传而来,但在我看来,多年苦读也是极重要的原因。不能查阅资料,不能写字,著作何

由而成？即使有学生帮忙，但引用什么书和文章，也需要先生先从记忆的仓库中示以门径。年近80，几十年间读过的书、文，几如烟海，出处、卷次还能记得那么清楚吗？

我也曾和先生谈到自己思考文化问题的心得：关于文化的层次、文化融合，等等。我们师徒间最重要的共识是，重新清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弘扬其中优秀而仍适用今天的部分，大胆学习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化，吸收于己有用的部分，是抵御腐朽、颓废文化侵略的利器；符合大自然和人类社会规律的、永不停步地吐故纳新的文化，是民族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中华民族文化就是这样一个永远照耀各族人民心灵、凝聚全国人民的伟大力量。

去年春节，同班同学照例相聚于先生周围。我走过去叫了一声“谢先生”，先生马上听出了是我，说：“是嘉璐！我正要找你。我的文化史写完了，我想请你写一篇序。”“我？学生怎么敢给先生写序呢？”“我想了很久。不是因为你是副委员长，是因为在同学中只有你是学文的，也在研究文化，更知道我的甘苦。”

任务接下来了。我冒昧地提出，需要先拜读全稿才能动笔，这是我的习惯。今年5月31日，收到了先生寄来的厚厚两包打印稿。展开，首先看到的是一封两页的信，中云：“拙著《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渊源》稿已完成。其完成过程历尽艰难与不幸，言之胆寒。多亏广元、庄鼎等同学相助，死灰之心，稍得舒解。”“回想五十多年前（北京）一中高三乙班同学们，热爱集体，互助互谅，自珍自重，虽各有成就不同，但当年友谊之情，始终如一，不能不令人感慨。”读了这封信，许久，我没有翻阅书稿，记忆的碎片不断涌出，一群未更世事的少年环绕在老师周围的往事不断在脑海里浮现。

我们上高中时，先生刚从北大历史系毕业不久。第一堂历史课讲的是什么早已忘记，但先生厚厚的眼镜片、平整的灰色中山装、系得整整齐齐的衣扣，却牢牢地记住了。（即使是炎热的夏天，先生也总是穿长袖衬衣，领扣、袖扣全部系上。）上他的课是要集中注意力的：他虽然

并不幽默,但语言简练,逻辑性强,不重复,无赘语;瓶子底般眼镜片后面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时时环视着整个教室,不容你走神;他从不看课本或教案,但是语言连贯,一气呵成,一“灌”就是一堂课。现在细细回味,我后来从事古代汉语教学和研究,历史知识的底子,还是因为上他的课不敢懈怠的结果。和先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的语文老师、著名语法学家刘世儒,衣扣从来扣不齐全,胡子时常不刮,站着讲的时候少,坐在讲台上也是语调铿锵,时而幽默,别人还没笑,他先哈哈大笑起来,板书也是随意而为,横竖大小一概不拘。总之,是一副名士派头。他常常面色苍白,是开夜车的标记。上他的课是可以随便一些的,甚至可以偶尔交头接耳。两位先生的风格虽然迥异,但都给学生们留下了至老不忘的记忆。(令人痛心的是,刘先生于其将满甲子之年即不幸病逝。)

谢先生对学生既放手,又关心,那时候的高中生自治能力也强,什么活动都是班干部和同学们商量、策划、准备,他只是从旁协助,予以鼓励。如此宽松,于是人人自愿参与,装饰教室、编练节目、筹备游行、上街宣传、组织联欢,我们班成为全校最活跃的集体。

先生那时独身,住在校园对面的教师宿舍里。同学不时地到他房里去玩。我在班上年龄最小,又有点儿淘气,似乎有点怕他,去得少,但是也有好多次在他房里吃糖果,随着他到鼓楼附近馆子里“蹭”饭。他是位严肃的老师,又是让人可以接近、愿意接近的兄长。全班同学都佩服他的学问,底下议论:听说谢先生是历史学大家翁独健的高足,通读过两遍二十四史!学校图书馆晒线装书时我们看到过,一部二十四史能装一车!敬佩、崇拜、亲切,大概就是使得我们几位在京的同学一直和他保持密切联系——“文化大革命”时除外——的原因吧。先生在给我的那封信里,希望我写写我们那个可爱的集体,“此亦符合我书主旨之精神也”。是的,如果用文化学、社会学的视角回顾我们50年前的高中生活,可以说处处弥漫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气息,既有传统文化中注重人际关系、集体关系,爱集体、爱老师、爱祖国,谦和忍让、自立自

强、奋发节俭等人生哲学,也有对新知新学的奋力汲取,对传统的怀疑和批判。当然不能说年轻的我们所想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对的,但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是高三乙班的共同愿望,“大方向”是可以无悔的。我想,只有具备了明确的人生价值的追求,才可以持久。同班的学长们大多已经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岁,退休有年,一个个儿孙成行,在家是让人照顾的,但对恩师,却始终“有事,弟子服其劳”。周广元、庄鼎、裘大鹏……代表大家时时对先生有所照拂——在这点上我时常因未能尽弟子之义而愧疚。无怪乎事隔50年后,先生完成新著的时候还想到当年的学生们,或许这批昔时的青少年就是他写这部《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渊源》的想象背景,书里分析推崇的中华民族道德、哲学,也是他当年领着我们走上人生之路时用无声的语言指出的理想彼岸。

打开先生的书稿,我立即被吸引住了。读着那简练而饱含对祖国文化的理性信念和挚爱感情的文字,就像是又回到了高三乙班的课堂。我以补偿年幼未能好好跟先生学习的损失的心境仔细拜读,真想一口气看下去,就像上谢先生的课那样专心致志,但是做不到。从六月到九月,正是到各地视察、调研最频繁的时候,于是书稿跟着我东奔西跑;在外地,有时到凌晨还在网上办公,或赶写第二天急需的东西,常常书稿原封不动地又背回来。序,一拖再拖,我时时担心哪天先生来电催促——这样一篇文章还要老师惦记,实在不应该。两个多月过去了,其间先生见到我,竟毫无催促之意,还一再提醒:要多注意身体!这是对学生的体谅和爱护啊。其实先生在信里已经说了:你“难得休息时间,我真不忍心为此小事打扰你。”这怎么能是小事呢?于先生,于我,于同学们,都是应该认真对待的事。终于,访日期间,在东京、栃木等地宁静的夜里,在受小笠原地震波及,大厦不停的摇晃中,读完了全稿。

现在,谈中华文化的论著渐渐多起来了。这是好现象。但是,专论某一领域或某一专题的多,横向或纵向地进行宏观论述的还比较少,大概因为这样的书对作者的功底要求得更高吧。先生这部著作竟然从远古论至辛亥革命,上下几千年。如果完全按照通史那样铺开来讲,恐怕

再有几倍的篇幅也难以把文化渊源论述清楚。先生采用了抓住重点,略及其他的办法,因此给人以要言不烦的感觉。这个重点就是中华文化在历史的每个阶段是怎样自我完善的,特别是怎样在和异质文化的接触中学习、吸纳、融合,化为己有,从而发展壮大,以至成为世界上惟一几千年未尝中断的辉煌文明的。

先生此书既非空言道理,也不是详述史实——我们的很多历史书习惯如此——而是夹叙夹议,论不空发,事不泛说,中华文化沿革的规律渐渐昭然,而其中颇多先生的独到之见。例如第五章论“佛教、道教与玄学、经学”,分析经学分立、儒道相融;第六章论“儒、释、道三教鼎立局面之形成”,阐述经学统一,禅宗形成,都是把数百年棼如繁复的文化现象围绕全书的重点条分缕析地进行剖析,告诉读者:表面看似截然对立的学派或宗教,实则也有相依相融的一面,六朝清谈话题之“才”、“性”、“情”、“欲”,实融儒道二家之理。“儒家以圣人大公无私为‘无欲’,道家以圣人超然物外为‘无欲’;儒家言‘无欲’系从‘有’之观点出发,道家言‘无欲’系从‘虚无’之观点出发,因二家所持宇宙本体论不同”;“尽管各家各派各持其理,各异其辞,但对‘物欲’之论,除张湛能明确大胆持肯定态度外,几乎皆持否定态度。”因此,“玄学自兴起、隆盛到衰落、湮消,并非在一单一文化背景中孤立独特发展,而是始终都与儒家处于相反相成既斗争又结合过程中走完自己时代历程。所谓‘湮’,并非谓无声息,而指湮消于儒、道两家学说融合洪流中也。”又如在论佛教中国化——禅化过程时,先生指出:菩提达摩提出“理入”、“行入”,“颇与老、庄思想相合”,为初期禅宗“渐修”学说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以为“此可能为禅学传入中国得以迅速流传之一重要原因”;先生固依南宗所传祖系为说,但一则强调了竺道生“立‘顿悟成佛’说”,“提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主张”,也为后来慧能、神会准备了理论基础(璐按,此点与钱穆先生暗合),只不过道生身后无大师相继,久不为人所重,需要等六祖弘扬而已;二则指出儒家之“人皆可以为尧、舜”,实与“一阐提人皆得成佛”“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三则概括云:

“禅宗由印度传入中国,通过中国僧侣之努力,以佛教‘随缘’说,道家‘自然’说,儒家仁义‘放心’说,融合而成中国禅宗教派,为中国古代哲学增添了活力,对后世宋、明理学之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与有些讲佛教史的论著把禅宗主要理念的形成和提出都归之于慧能一人显然有所不同,可能也与现今佛教界的一些认识有异。似述而实作,似史而实论,欲阐之理淹贯于全书,这恐怕是先生此著的特点之一吧。

儒、释、道三者在自汉至明长达一千多年时间里始终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我认为,谈中国经学和理学、谈中国的宗教沿革、谈中国的伦理道德,乃至谈中国的哲学,就不能不把儒、释、道的关系作为背景。同时,三者的辩证关系,是中华文化之所以成长为浩浩长河永不枯竭的原因,剖析之,则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具备兼容并蓄、广纳群川、自觉觉他、善于从异质文化中择取营养的特性,不待多言而自明矣。欲深入研究中华文化,就不能不就此进行钻研。读先生此稿,更坚定了我的这一想法,不知这是否是先生的本意?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终目的是为了人,为了人生,为了社会,为了人类。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一日千里的今天,强势经济挟带着强势文化向全世界扩展蔓延。很多人难以辨别经济的强势与文化的强势、文化的强势与文化的先进,于是鄙夷自己民族固有文化,误把外来文化中野性与兽性的现象当做时尚,犹如认疮痍为蜜糖者有之;惊诧于文化冲突之激烈,视一切外来文化为洪水猛兽,一概拒斥之者有之;面对中华表层文化被冲击,中层文化中之艺术、礼仪等也似乎招架乏力,因而悲观者亦有之。到底应该怎样判断中华文化所面临的形势,应该怎样应对有些人极力推行的“文化一体化”和预言的“文明的冲突”?我以为关键在于“文化的自觉”,也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懂得人类文化产生、演变、发展的规律,明了自己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优缺点、未来走向。要达到文化自觉,一要了解民族文化所走过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发生过的事情,有哪些经验和教训;二要洞察世界风云变

化,注意各个国家间文化接触、对话和侵略反侵略的动向;三要认真思考和研究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吸取世界各国优良文化中的营养。

显然,文化自觉是从“知之”开始的。因此,谢先生的这本著作现在出版正是时候,它将使更多的人知其事,明其理,如果能由此而引起人们的讨论和争辩则更好,这将有利于振兴中华民族伟大文化。

当我读完先生的书稿时,我彻底明白了先生何以在八十高龄之时,还要以眼残体弱之身撰写这部《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渊源》。先生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执著,克服写作种种困难的毅力,也正是中华民族热爱祖国、坚忍不拔精神的具体体现。中华民族自古注重知行合一,先生是矣,又在我们这批已届老年的学生面前做了一次示范。

这篇序虽是我写的,并且将冠以我名,但我要声明,实际上的作者应该是半个世纪前受先生亲炙的北京一中高三乙班全体同学,特别是平日照顾先生的同学们。

最后,我想用这样一句代表同学们说的话作为文章的结尾:祝先生健康长寿。

2004年9月19日夜

谨书于日读一卷书屋

注:

① 其中原委已在拙著《未了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的序里谈到。

目 录

序	许嘉璐(1)
第一章 概论	(1)
第一节 我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之演变与动力	(1)
第二节 中华民族精神之要素与作用	(7)
第三节 研究中国思想史之目的	(16)
第四节 研究中国思想史之方法	(24)
第二章 儒家的起源及其形成	(32)
第一节 “儒”的由来	(32)
第二节 孔子与儒家	(50)
第三节 儒家经典——“五经”、“四书”	(82)
第四节 儒家的基本道德核心——仁、义	(147)
第五节 理想的人格与理想的社会	(192)
第三章 百家争鸣中的儒家	(231)
第一节 儒、墨之间的斗争	(231)
第二节 儒、道之间的斗争	(273)
第三节 儒家内部孟、荀之间的分歧	(315)
第四节 秦统一前后之儒法斗争	(360)

第四章 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	(398)
第一节 汉初之儒、道关系	(398)
第二节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425)
第三节 儒学昌明时期之经学与哲学	(447)
第五章 佛教、道教与玄学、经学	(473)
第一节 佛教之传入及其传布	(473)
第二节 道教之创立及其演变	(501)
第三节 玄学之兴盛及其影响	(530)
第四节 经学之南北分立	(559)
第六章 儒、释、道三教鼎立局面之形成	(572)
第一节 经学之再次统一	(572)
第二节 佛教之极盛时期	(597)
第三节 道教组织之完备及其发展变化	(624)
第七章 新儒学之兴起及其发展变化	(640)
第一节 经学之反思与出路	(640)
第二节 河图洛书与太极图说	(654)
第三节 “理学”、“心学”之建立及其异同	(666)
第四节 宋学之“衰落”与汉学之“复兴”	(683)
第八章 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争鸣局面之再现	(695)
第一节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革概要	(695)
第二节 “夷夏”观念之转变与影响	(700)
第三节 中西文化碰撞所引发之自我反思	(713)
第四节 中西文化在冲突中走向融洽	(727)
第五节 迎接希望 向往未来	(749)
后 记	(761)

第一章 概 论

第一节 我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之演变与动力

就空间而言,作为一个国家专名之“中国”一词,如何演变,不能不加以探讨。

我国古代,“中国”一词,原为一地区概念,还未成为国家名称。此词最早见于《诗·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朱熹《诗经集传》注:“中国,京师也。”自夏、商、周三代至战国,京师多在黄河中游地带南北两岸,即今陕西东南及河南部分地区,故历代将京师及其附近辖区统称之为“中国”、“中土”、“中原”、“中华”、“中夏”,距京师较远之四方周边国土,概称之为夷、戎、蛮、狄。秦统一全国,古印度、希腊、罗马等地人称中国人为“秦”人,对音为 *cina*、*Thin*、*sina*,汉译印度佛教典籍则称之为“支那”、“至那”、“脂那”。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魏晋。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估计当是采用佛经中之汉字译音。汉、唐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强盛朝代,故凡与当时中国接触之外国人,概称中国人为“汉人”、“唐人”。至今欧、美、亚不少国家凡有华人定居之处,还保留有“唐人街”这一名称。“中国”一词,作为一个拥有全部领土、领海、领空主权之国家名称,始于 19 世纪中叶;从此这一名称专指中国而言,不再别有所指。

就时间而言,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分类之“历史”一词,亦不能不加以探讨。

中国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史官、史书出现得均很早,在古代史官有左、右史之分,一记事,一记言,各有专责。“记事”指记举动、行为;“记言”,指记言语、思想。《春秋》、《尚书》就是现存我国最古的两部分别记事、记言的典籍。后来,记言、记事渐趋合一,《国语》、《左传》就可明显看出这种趋向,《国语》以记言为主兼有一些记事,《左传》以记事为主也兼有不少记言;到司马迁作《史记》,则完全打破了“事”与“言”分记的界限,创立纪、传、表体,真正奠定我国古代史书写法体例。

从《尚书》到《史记》,其间大约上千年,所有先秦古籍记载凡史官、史书皆称“史”。“史”,《说文》:“𠂔,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至于“历史”二字联结在一起作为一个名词,特别是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名词,从何时开始?由于史籍浩繁,一时无法断言。《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书》,提到吴使赵咨答魏文帝曹丕问:“吴主……志在经略,足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此处“历史”二字虽连书,但通读该文上下语句,此“历”字应如《说文》所言,当做“传世”、“过也”解释,意即“历代所传之史”。

查阅《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崇文总目》、《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以及《书目答问》等目录学著作史部类,均未见有将“历史”二字连用作为书名者。

然据现代科学所知,在人类理性思维发展过程中,大脑之记忆功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果人没有记忆,一切经验不能贮存,理性思维缺乏素材难以进行,那么人类将永远只能靠感觉器官所形成之条件反射来适应环境维持生存,永远无法战胜环境,改造客观世界。但任何人都是一个有限存在,一旦死亡,记忆即随之消失。历史记载,就是为了弥补人类这一缺陷,代替大脑记忆功能来贮存记忆并使之代代流传之最有效方法,它以抽象符号——形、音、意之文字,将人类转瞬即逝之行为活动和精神活动凝固为感觉器官所能接受之信息,永久保留于图书馆中,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提供宝贵资料来源。它是人类记忆功能

之延续,时代之挂钩,将过去、现在、未来之文化连成一条永无止境之长链;在这条长链中,每一环节都闪耀着一个民族所表现出之理性智慧和—个国家所表现出之生命活力。此即历史所具有之永恒价值。

至于“历史”二字连用作为一个近代学科名词何时出现,难以确知,大约始于清末戊戌政变前后,章炳麟《序种姓上》:“潮湿沧热之异而理色变,牝牡接构之异而颅骨变,社会阶级之异而风教变……故今世种同者古或异,种异者古或同,要以有史为限,断则谓之历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馥书》1899年左右刊刻)梁启超(1873—1929年)《三十自述》:“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师……六月日本战事起,惋愤时局,时有所吐露,人微言轻,莫之闻也。顾益读书,治算学、地理、历史。”(此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作新社”编《万国历史》、上海“普通学书室”编《普通新历史》、夏曾佑撰《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是当时一些新式学堂创办后应运而生之一批最新历史教科书。《万国历史》曾被清学部列为国家规定课本,《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33年商务印书馆重印改名为《中国古代史》,收入“大学丛书”。从此,“历史”作为一个学科概念,便渐为人们所熟悉而习用。

严格地讲,我国古代史书,鲜有不受经学思想之束缚。读书人十年寒窗,研读的主要是经,读史只是为了“解经”或“穷经”。史书地位低于经书。古籍编目中,经书称“甲部”,居于首位;史书称“乙部”,居经书之次。全部二十五史,有《儒林传》,而无《史林传》,所有史学家均被包括在儒家之内。清乾、嘉时期的学者章学诚曾提出“六经皆史”之主张,其目的就在于打破“六经”之神圣地位,用研究史学之态度和方法来对待儒家经典,借此加强人们对史学之重视。

由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学说之输入,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建立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对旧史学的内容、书法及其指导思想,展开了猛烈抨击,提出了“史界革命”口号,影响甚大。与此同时,一批留日学生竞相翻译介绍日本史学名著,

辗转将西方一些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传进国内,开阔了中国史学家的眼界。正是在这些条件下,中国史学才能真正摆脱经学羁绊,走上独立发展自己体系的道路,成为一门真正具有近代史学理论指导的学科。上述几种新式历史教科书,就是代表近代中国史学园地最早开放的几株“报春之花”。

历史这门学科,依照近代图书分类,可以分成许多支,通史、专史就是其中最重要两支。中国通史与中国思想史一记行为,一记思想,从表面上看,似与古史言、行分记相类;其实不然,两者有着本质差别。古史所记言、行,以君主个人为中心;今史所记言、行,以国家、民族全体成员为中心。古史有左、右史之分职,各人所记均只史实之一半;今史乃通史、专史学科之分类,非人事上之分职,且各史所记均为史实全貌,并无割裂之弊。古今时代不同,历史之性质与内容也不同,此点不可相混。

尽管学科分类不同,然而彼此之关系却有如日月同曜,缺一不可。思想史如果脱离了通史的内容,必将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反之,通史如果缺乏思想史在其专门领域内之深入探讨,则将很难把握住历史人物之内心活动,以致会模糊史实之本质。

如上所述,中国通史和中国思想史关系虽很密切,但其所述重点各有不同。

就文化一词内涵意义而言,如何演变同样须加以探讨。

“文”,古指礼乐,或指律令条文。《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集注》云:“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

“化”,“转变”、“改变”之谓也。儒家强调礼乐教化,使人悦服,弃恶而向善;法家强调刑法驯化,使人畏惧,不敢从恶不得不趋善。《礼记·学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通“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管子·七法》:“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前者之“化”为“教化”,着重诱导;后者之“化”为“驯化”,着重强迫。但无论儒家,还是法家,所释

之“文”均仅指精神成果而言,并未把物质成果包括在内;所释之“化”,亦均仅指对民心之“教化”、“驯化”而言,也并未把加工于自然后所引起之变化包括在内。

无论释为“驯化”或释为“教化”,均只说明了人类精神生活一个方面,并未概括“文化”二字内涵意义中人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另一方面。故未能将“文化”一词完整内容明确诠释清楚。按:当人类成为万物灵长之日起,即人类有意识利用工具和制作工具从事简单生产劳动之日起,人类精神生活——共同之收获、喜悦、惊恐、逃避等种种行为即随之而生,这时“文化”即已开始。起初,驱动原始“文化”之动力,为人类生来俱有之“求生”(保全自我)与繁殖(雌雄交配,延续后代)欲望。此种原始动力之欲望,无所谓是非、善恶之分,皆受自然生命法则之支配。惟人类生产技术愈来愈提高,物质生活愈来愈丰富,伴随之精神生活愈来愈多彩,则人类与其他动物最初相同之原始欲望起点距离现实社会愈来愈远,保全自我与延续后代虽仍是推动文化之动力,但已有是非、善恶、当与不当、义与不义之分。

随着生活质量之日益提高,人之享受欲望也同时水涨船高。从求生之欲望原点出发,往前,欲望膨胀离原点愈来愈远,此种趋势,永远不会停止。原点之欲,本无善恶之分,然膨胀之欲却有好坏之别;因前者纯系天然之性,而后者则渗入了社会之性。天然之性,与生俱来,循“物竞天择”自然法则之发展而发展,此点人与其他动物并无差别;社会之性,人群相互习染而成,受各种公私、利害、得失诸多矛盾因素之制约,循社会规律之变化而变化,此点人与其他动物则迥然有异。

欲望,本该是刺激人类谋求生存发展,满足衣食住行需要之原动力,起初并无善与不善之分野,后因社会习染方有当与不当之界限。取之有方,得之有道,则善;取之无方,得之无道,则恶。当与不当之标准,取之于处理公私、利害冲突之态度。

“文化”之全部还须包括物质财富积累、精神财富积累相互作用而形成之习俗、道德、思维方式(指代表信息符号——语言、文字之组合、